

宗慶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崇慶縣委員會
編

征 稿 启 事

《崇庆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以来，深受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谨表谢忱！

文史资料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更有发展经济，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以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本刊已出版四辑，今后还要广征博采各类资料，继续出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借鉴”的作用。

我县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文化发达，人才众多，留存着丰富的文史资料。有些史料是人亡即逝，急待抢救。征集的时限，上起“戊戌政变”，下至“文革”前夕。征集的范围十分广泛，凡时限内有关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医药、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风俗、名胜古迹、诗文佳作、天文地理、名人轶事都系征集内容。

请各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各单位同志，踊跃撰写，秉笔直书，为促进改革和振兴经济贡献力量！

政协崇庆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组 启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目 录

蜀中自古无降将

——忆鸦片战争中的王国英

……………王斯建口述 王羊谷整理 (1)

回忆进军大西南……………王振垣 (9)

徐州南逃目击记……………魏煜焜 (15)

川西著名匪特头子李泽儒落网伏法记

……………陈力群 (22)

王陵基兵败怀远镇见闻……………马世勋 (26)

记李之青在崇二三事……………杨宇皋 (34)

蜀州龙……………石冠觉 (41)

袍哥钩沉探微

——由崇庆袍哥组织说来道去

……………陈柏青 (51)

永无休止的诉讼……………毛甫澄 (84)

徐荆石先生传略……………周之鹄 (88)

崇庆县商会与同业公会……………孙味棋 (91)

陈福安烟帮遭劫记……………施权新 (95)

崇庆县戏曲活动概况……………毛甫澄 (100)

回忆在大跃进中的一件事

……………杨定均口述 雷志华整理 (105)

解放前崇庆县国药业概略……………罗度非 (109)

蜀中自古无降将

——忆鸦片战争中的王国英

王斯建口述 王羊谷整理

在鸦片战争中，王国英为国捐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四川广播电视报》第四版刊载“川军出川抗英记”一文：

“……四川先后派出六千多名健儿，转战于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将士们胸怀报国志，抗击英帝侵略军。……在浙江攻取宁波的战斗中，涌现出了参将王国英和少数民族将领阿本穰（是世袭土司兼管大金河防务千总）、哈克里（四川松潘瓦寺守备）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

十一月十二日晨七时四十分，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传英在成都广播电台“知识厅”节目中播讲四川近代史时说：

“宁波人民怀念王国英，为之立庙塑像，有阿本穰、哈克里二将一同陪祀。……王国英四川崇庆县大罗寺人”。

查阅历史资料：

- 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44卷第1—8页。
- 二、《清史稿》卷37，第21页。
- 三、《续四川通志稿》“人物志”（宋育仁主编）。

以上资料，对王国英事迹，虽记载较详，但有王国英的遗闻轶事及其他方面，则阙而不见。作一番系统的简叙，也有必要。

一、王国英的家世及其思想

王国英名昌福，字擢廷，号国英。出生于满清中期公元一七九〇年庚戌之秋七月。生长在四川崇庆县元通场大罗寺侧近（即现在的元通镇石梯村，其六世孙王泽民曾任该村村干部），原籍江西省修水县俸乡江头村。他的曾祖父王永儒于清康熙年间来川落业为农，以耕读相传，至今已十世。

他七岁束发受书，十九岁入黉门，屡试不第，即弃文习武。曾写有“投笔从戎”七律诗一首如下：

岂令儒冠误我躬，壮怀投笔气如虹。
生花垂尽三秋露，破浪乘来万里风。
远请长缨边塞黑，寒鸣古剑夜灯红。
从今安用毛锥子，袁泽兴歌敌忾同。

并在此诗后面写道：

“余开始治学，甚自尊大，颇慕古人之大有作为者。当今尚孔孟，重八股，喜对偶声律之学，抑经纶济世之才，即或稍有成就，亦迂儒也”。

其后，到蒲江县访友，经“同年”杨玉麟秀才介绍，得与什邡县马祖寺僧人慧觉交往四年，僧授以北宋杨家将门派的“十三枪”枪法（这件事为怀远镇人高永年所讲，高是王姓的老亲）。考中武举后，历任军职，在陕甘几次边患中，屡建奇功，升任陕西汉中守备，继调西昌靖远营守备。

在这之前，亦即考中武举之初，有彭县、温江、双流、

大邑……等县的武生多人，前来求他教习武艺。有一次他在那酒酣耳热的时候，高兴的说：我是蜀州人，宋朝的诗人陆放翁做过蜀州通判，是我十分景仰的人。陆有一首词叫做《蝶恋花》，词的下阕写道：“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识此身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你们找我切磋，我这“一卷兵书”交得脱了。又曾多次对其长子锡文说：我家祖籍在江西。读《宋史·文天祥本传》：

“文天祥字宋瑞，亦字履善，号文山，赣之吉水人也”。生长在江西庐陵吉安之文天祥，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榜样。文的才气我学不到，但文的志气我可以学。他这样激励自己，教育儿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算难能可贵。因为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文武两途，往往是青少年所向往的。但他虽有屡试不第的政治苦闷，而毅然决然的弃文习武，并以陆放翁、文天祥自喻，他的坚强意志和忠贞爱国思想，是有坚实基础的。

二、王国英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业绩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满清王朝的乾、嘉两代，穷兵黩武，大张挾伐，国库亏耗较大，朝廷闭关自守，老大苟安，因而政治腐败，日趋没落。疯狂的资本主义的英帝国，即乘其虚弱落后，使用洋枪洋炮，吓住清朝政府，以贸易为幌子，把灭绝人种的万恶的鸦片烟源源输入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仅在一八三零年至一八四〇年，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便输入鸦片四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箱（每箱约重一百二十斤），合计五百四十四万一千六百四十斤。

这一笔惊人的鸦片数字，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它把中国人民辛勤积

攒的白银，平均每年吸取七、八百万元（每个银元的重量是库秤七钱二分），约折合五百万两以上（十年总计就是五千多万两）。长此下去，当时的四亿五千万人口，平均每人每口该摊多少呢？！怎样负担得起？！国计民生又将何以维持？！何况鸦片的输入量还在逐年增加，有增无已！

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又查出一万九千多箱另二千一百多袋。同年六月，在虎门海滩焚烧销毁。火焰与怒气汇集成一起，焚化了英国强盗的贪馋掠夺，为中华民族大大舒张了一口气。

英国强盗不肯干休，于次年（一八四零年）六月，撕开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张牙舞爪地派出“东方远征军”四千名，兵舰四十八艘，配备大炮五百四十门，大肆争城掠地，到处杀人放火，企图征服资源丰富的中国，使之沦为它的殖民地。

它们不可能料到，英雄的中华儿女，高举爱国的正义旗帜，战斗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惜牺牲生命，不怕英军的洋枪洋炮，日日夜夜，前仆后继，一直打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就是举世皆知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揭开了民族战争的序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尽管英国强盗避开广东的正面战，改变了主攻方向，攻厦门，占定海，陷镇江、逼南京，伟大的炎黄子孙，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军民一致，敌忾同仇，奏请道光皇帝调兵遣将，以追歼窜犯之敌。迫使道光皇帝一声令下，全国十八个省齐动戈矛。四川虽僻处西陲，当然也不例外。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国英的“请纓”壮志实现了。通过军机大臣奕经（旗人）的同意和保奏，道光皇帝召令他“进京陛见（进京的其他官员，也积集在九龙口引见）”。

他立即驰往北京，在宫殿之下，慷慨陈词说：“国难如此，微臣不敢爱身”。皇帝擢膺他为参将，命他戍守宁波。这是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的事。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他星夜兼程奔赴宁波，正是战争紧张激烈时刻，到达宁波境界时，遭遇英军头子（副统帅）义律的主力部队，遮断交通。他即在将军文蔚（旗人）帐下，讨领精骑三百，以雄鹰搏兔之势，冲杀入城，与守城官兵会后，待机出击。

不幸川军指挥官齐慎（旗人）是四川提督，贪生怕死，犹豫不进，宁波城便完全陷入包围圈。他固守弹丸之城，尺寸之地，以微弱之众（连民兵不到五千）抗凶顽之敌，十几天不见增援，兵疲粮空，抵抗力弱，局面十分被动，英军蜂涌登城。他环着城垣转战，或东南，或西北，马不停蹄，指挥若定。那里危急，他就赶到那里督战，东南西北四城头，都有他的刀光剑影，英军伤亡惨重，无法入城。随后，他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争取主动，决计以攻为守，转守为攻。趁着一个夜晚雨雪纷飞的有利时机，挑选强悍军士百余人轻骑出城，袭击英军统帅部。夜色茫茫，雪地如银海一般，白光反射，方向迷离，不幸连人带马坠落陷井，受重伤，被擒虏，宁波城随之而破。

三、王国英殉节以后

一封紧急奏章，带着王国英不幸殉节的消息飞到北京，道光皇帝毫不犹豫地地下“圣旨”：“宁波城守将王国英协降不屈，骂贼身死，实属英勇可嘉，追封“忠勇公”谥号“巴图鲁”（满人称壮士），赐世袭“云骑尉”。拨库银伍千两，着伊子王锡文护柩返籍安葬”。（见《崇庆县志》）附文：

“御赐沉香木精工雕刻入头（因有尸无首）特制冠袍锦带，盛礼入殓，沿途道、府、州、县，迎接护送”。

道光皇帝亲笔题词：

马革裹尸才算死，

麟编载笔俨如生。

京中文武大员吊唁的诗文、对联不少。其中翰林大学士冯国霖的一篇诔文写道：

“呜噫卓哉！王公之大节、炳炳烺烺

同日月。头可断，眼可摘，舌可拔，

指可截，此身不可受贼胁。海风琅琅

山苍苍，我来凭吊蓬莱旁，人生生死

有何常，男儿怕死不沙场”。

他的孙儿王家鼎（字午庄）将京中、省中、和一些道、府、州、县祭吊的诗文、对联，汇编成集，名曰《王忠勇公集》，崇庆县中可能还有版本留存。“集”的第一部份，记载着皇帝诏文和有关表章，以及国英公生平事略。年岁久远，变动频繁，《王靖远堂》的家谱也遗失了，葬在元通大罗寺瓦窑坎老庐之后的王国英墓和碑石也消失了。现时尚可查证者，只有元通镇增福上街四十四号住宅（现在红旗旅馆）第二道大门上还镌有罗元麟撰写的石刻楹联一付，

上写着：

宁波义烈彪麟笔

文井清光耀鲤庭

匾额是：琅琊旧望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王国英的曾孙王朝鼎（名裕鼎字铸九）报请承袭“云骑尉”（世袭因故间断，故须重新报请），京中部文批回：“王国英阵亡时日不详，另

报”。本来他在大雪之夜，引兵袭击英军，究为何月何日，已无所稽考。浙江是我国东南部霜雪较少，但根据翰林学士李眉孙（中江县人，作过曾国藩的幕府）的谏文：“李塋入蔡州，狄青夺昆仑，彷彿今宵景色”等词句证明，确为大雪之夜（或冬末春初），只好具文复报：“宁波城陷之日，便是先祖国英公阵亡之时”。于是王朝鼎得承袭“云骑尉”，隶属于四川督署之督标中营，曾在“川江巡井道”观察使（道台）王坦名下担任分区职责（见《崇庆县志》）。

笔者幼年时代看过《王忠勇公集》，距今已五十多年了，尚能记诵其中一些词句，特别难忘的是：

生不封侯悲李广，死后骂贼似张巡。

蜀中自古无降将，海外于今有令名。

提起张巡实多感慨，张中丞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县），睢阳人为之立庙；王国英死守宁波，宁波人也为之立庙。论时代，相隔一千多年；论事实，一则为“安史之乱”，一则为“鸦片战争”，时不同，事不同，入心则古今相同。此何故呢？正确的回答是：凡是忠诚爱国的人，凡是忠于人民，忠于人民事业的人，人民都永志不忘。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封建皇帝的任何封赠都是暂时的。灌县“二王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灌县人民把秦惠王时代治理都江堰水利的太守李冰父子奉为神明，立庙奉祀。

正是：

父老谈之犹动色

男儿死耳复何言

——张巡庙联句

王国英在自己的诗篇里所写到的：“远请长缨之志”，“冀泽兴歌”之慨，都誓言般地实现了。我们国家的“边

塞”，也将永远“不黑”了。言行一致，有始有终，他的政治抱负是远大的，政治品质是高尚的。可恨满清王朝丧权辱国，于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南京条约》，给中华民族涂上一层从来没有的污垢！多少仁人志士的鲜血，包括王国英在内的鲜血，白流了！王国英泉下有知，必将如南宋时候的抗金英雄宗泽，反对议和，大呼：“过河杀贼”。屈膝投降的《南京条约》戴上一顶“半殖民地”的帽子，就戴了一百零八年，一直戴到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啊！无数流血牺牲的先烈啊！光辉的史册和赞歌，都是人民谱写的。“立庙俸祀”只不过表达人民爱戴的形式罢了。

“知昔日，始可喻今者。观往事，所以察未然”。这是晋朝时候的大书法家王右军撰写的座右铭。联中“知”、“观”二字简直发人深省。应当把过去“同声一哭”的感情，转化为高歌猛进、振兴中华的气魄，保卫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不许任何侵略者蚕食鲸吞，以慰所有先烈辈在天之灵。上述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动人情景，使我沉痛地怀念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高祖父国英公！……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回忆进军大西南

——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和

四川解放四十周年而撰

王振垣

南京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后，二野领导机关由桐城经合肥进住南京。刘伯承司令员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任副职，邓政委主持总前委工作，住镇江。进南京的当天，李达参谋长看机关驻地时说：好好搞，我们要住两年。之后，我从经手的一份电报中知道，二野的任务是进军大西南。七月一日，我们听了李参谋长在“国民大会堂”向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作的进军大西南的传达动员。在此之前，我们科的同志还阅读了我们科长听邓政委向团以上干部动员报告的笔记。

八月一日，在南京兽医大学校园里举行誓师大会。大型条幅上写着：“解放大西南七千万人民”。会后，直属党委又主持过多次动员，各单位反复讨论，开展挑战、迎战，订立功计划等活动。在动员准备成熟的情况下，于十月二十日离开南京。

初进南京时说要住两年，尔后又向西南进军。过后，从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才知道：按国民党在华东的军事力量，三

野完全可以解决，二野进入华东是预防攻占上海时美国出兵挑起大的战争。三野部队于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上海，美国第七舰队不战而逃，二野才可能按既定任务进军西南，解放川康云贵四省。

西南是国民党要保住的重点区。要保住西南，以四川为防守的重点，依秦岭山脉构成主要防线，企图阻解放军由陕入川。而防守秦岭又为其重点的重点。至于川东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势险要，并有白崇禧重兵防守，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绝不会选择其为入川口。

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刘邓首长全面分析了敌情，拟定了进军西南的作战要旨：避开敌人的重点防守，出其不意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各个歼灭西南之敌。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聚歼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由陕入川的十八兵团攻占全川。

为了迷惑蒋军，保证二野从川黔边实行大迂回和大包围的顺利进行，一野部队对蒋军的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陕南和鄂西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进行佯动，二野指挥机关和三兵团乘车由南京经徐州、郑州向湘西开进。为了隐蔽我军意图，从南京到徐州、郑州一路上，刘邓首长一再公开露面，大造声势。十月二十日离南京时欢送告别大会，没有在市内举行，也没有在下关举行，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浦口举行。

在徐州车站，刘邓与陈毅司令员会面，庆贺胜利。到郑州时，刘邓又出现在郑州车站迎候的群众中间。故意放风。宣布解放军要向四川进军，佯示西进。然而从郑州开始，却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秘密南下。而且二野指挥机关乘坐的

列车没有开进汉口，而在汉口以北的黄陂车站停下，机关人员步行进住黄陂县城。第二天又步行至黄陂车站，坐上一列很不起眼的运货车于晚十时许开进汉口住下。几日后又南渡长江在武昌上车到长沙，尔后改乘汽车经湘西的常德和川东的秀山、酉阳、黔江、彭水等地到重庆。

川黔作战于十一月一日发起，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以突然迅速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同时二野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防线的两翼，解放军在湘西和湘鄂边境约一千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从陕入川的意料，从而打乱了他们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蒋军开始准备有计划的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川黔作战遂进入关键时刻。这时，刘邓首长对蒋军的动态作了详细的分析，立即果断地于十一月十一日指示五兵团和十军坚决隔断宋希濂、罗广文七个军向云南退路。电令指出：

“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乃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黔东、黔西及黔西北敌人的退路就被完全截断了。”

二野部队按照刘邓的指示，加速猛进。十一月二十一日五兵团解放了贵阳，十六、十七两个军已集结于贵阳周围，十八军即将到达贵阳，十军即将到达遵义，四野主力一部已在咸丰西北歼灭宋希濂部十四兵团（五个师）。在这种情

况下，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就更需精细、周密，稍有疏忽，就可能放跑敌人。为此，刘邓又一次对敌人的行军速度和路线，以及解放军相关的行动，作了精确的计算，立即指示五兵团及十军加速行动，指示中说：

“从战役全局作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指五兵团及十军）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和十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全断敌退路，而各个歼灭之。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

刘邓同时指示右翼的三兵团不要迅速行动，避免打草惊蛇，以正面拉敌多几天为有利，特别是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

蒋军的动向果然不出刘邓首长所料，他们也在同解放军争时间，抢速度。十一月二十三日，宋希濂在南川召集部将密商出路。商议的出路是：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选定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但是对于宋希濂来说，他的计划和步子太迟了。二野各部队在刘邓的指挥下，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他们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南川城，二十八日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三万余人，宋希濂率残部丢下乘骑行李，狼狈地步行逃命，于十二月十九日被二野全歼于大渡河两岸。

在歼灭宋希濂的同时，刘邓指挥三兵团于十一月三十日

解放了国民党“陪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为时四十天的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共歼灭敌军一个兵团部，十个整师及五十一个师的大部，计七万六千余人，解放了重庆、贵阳等一百三十二座城市。

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后，刘邓转而把全力集中在歼灭蒋介石最后的一支主力——胡宗南的作战上。为了全歼胡宗南于成都地区，刘邓在川黔作战结束前的十二月六日，命令二野部队继续西进，切断胡部之退路。命令中指出：

“我军渡江（指北渡长江），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一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成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

遵照刘邓的命令，二野三、五两兵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向乐山及其以北地区挺进，至二十日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退路。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了口袋形阵地，胡宗南部及川境残部完全被解放军包围。

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起了大陆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成都战役。刘、贺、邓分析，敌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个方向突围和进行最后顽抗，因此，要求部队行动必须谨慎，加强纵深配备，组织密切协同，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战场上的事态正如刘、贺、邓所料：敌人先是多次发起攻击，企图向西南突围，而后负隅顽抗。由于刘、贺、邓的准确预计和英明指挥，胡宗南主力被解放军一口一口吃掉，

胡宗南见势不妙，只身逃往台湾。

至此，进军大西南的整个作战计划基本结束。此次作战，历时两个月，在兄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共歼灭蒋军正规军、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九十万人。

进军西南是非常艰苦的，行军路程四千里（进军云南的四兵团则达八千里）。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月的阴雨，加上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前进道路上又横亘着起伏不平的山脉，山势陡，湍流多，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由于有华东、华中人民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队物资准备尚好（特别是每人备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二野所有部队士气高昂，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坚定地向指定目标进军。尤其是经广东、广西进军云南的四兵团，任务更重更急，且多经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隔阂深，遇到的困难更多更艰苦。尤其是当卢汉宣布起义后，窜入云南境内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要攻打昆明，卢汉通过邮电局的明码电报向刘邓首长呼救，刘邓首长指示四兵团：派一支轻装部队日夜兼程向昆明急进。这支部队的行军速度是一天一夜一百八十里，向滇西南追歼逃敌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按陈赓大将生前写的回忆录写的是二十天走三千里。遇到的困难和艰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一九八九年九月